

白话四库全书

史部

国语 战国策 史通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
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共收录古籍3460余种，
79300余卷，36000多册，240余万页，近10亿
字，分为经、史、子、集各部。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刘心莲 夏于全 主编

白话四库全书

史部·第一卷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四库全书/齐豫生,夏于全主编。—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1

ISBN 7-5385-2025-2

I. 白... II. ①齐...②夏... III. 四库全书—译文 IV. Z.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874 号

白话四库全书

出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话:5642217)

印刷: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版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

印张:260

书号:ISBN7-5385-2025-2/I·392

定价(全 30 册):698.00 元

史部第一卷之：

《国语》目录

祭公谏征犬戎	(7)
召公谏厉王止谤	(8)
襄王不许请隧	(9)
单子知陈必亡	(10)
展禽论祀爰居	(13)
里革断罟匡君	(14)
敬姜论劳逸	(15)
叔向贺贫	(16)
王孙圉论楚宝	(17)
诸稽郢行成于吴	(18)
申胥谏许越成	(19)
范蠡论战	(20)

《战国策》目录

苏秦以连横说秦	(27)
司马错论伐蜀	(29)
范雎说秦王	(31)
范雎论远交近攻	(32)
邹忌讽齐王纳谏	(33)

颜阖说齐王	(34)
冯谖客孟尝君	(36)
赵威后问齐使	(38)
庄辛论幸臣	(39)
触龙说赵太后	(40)
鲁仲连义不帝秦	(42)
鲁共公择言	(45)
唐雎说信陵君	(46)
唐雎不辱使命	(46)
乐毅报燕王书	(47)

《晏子春秋》目录

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	(54)
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	(54)

《贞观政要》目录

君道	(62)
政体	(67)
任贤	(74)
君臣鉴戒	(83)
尊敬师傅	(89)
崇儒	(93)
征伐	(95)
安边	(104)
畋猎	(108)
慎终	(110)

《史通》目录

六家.....	(122)
二体.....	(126)
序例.....	(128)
编次.....	(130)
言语.....	(131)
浮词.....	(134)
叙事.....	(135)
直书.....	(138)
曲笔.....	(140)
鉴识.....	(142)
核才.....	(144)
烦省.....	(145)
杂述.....	(147)
自叙.....	(149)
惑经.....	(151)

国 语

从世界范围来讲，记录公元前 476 年以前人类历史的上古史书，在西方只有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在中国则有《尚书》、《春秋》、《左传》和《国语》等，这几部史著出现，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学研究的辉煌成就，而其中《国语》的独特价值是颇值一论的。

《国语》这部穿透几千年历史烟云的不朽史作，其作者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悬案。汉代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是左丘明所作。最早持此观点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也说：“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而左丘明因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以为《国语》。”为《国语》作注的晋代学者韦昭也认为左丘明既撰《左传》，“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号曰《外传》”。但是，以上说法都不能回答为什么《国语》中记事所用之语有的竟出现在战国时期、左丘明之后？

于是，另一种说法油然而生，清代康有为、崔述等断言，《国语》和《左传》原为一书，至汉末刘歆才从《国语》中分出《左传》来，改为编年，羽翼《春秋》剩下的内容，“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不过，这种说法显然忽略了这两本书各自的特点，以及两书的相互抵触之处。这两点足以证明《国语》和《左传》原本并非一书，也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与《左传》文体不类，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认为《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左传》之简单峻健，甚至驳杂不类，如出他手”。清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中指出：“《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

体要，而《国语》文词枝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甚明。”上述诸家之说虽然有点扬《左传》抑《国语》，但其从文体风格上入手判定《国语》和《左传》并非一书，也非同一作者，则是比较正确的。既然原非一书，也就不存在《左传》从《国语》中分出的事。另外，从历史事实上看，早在刘歆之前《左传》和《国语》就已经各自流行了。据《晋书·束皙传》载：“初，太康二年，魏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皆楚晋事。”汲郡出土的《国语》就是今天《国语》中《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可见，至少在战国魏襄王或安釐王时期，《国语》就是独立成书的，不存在刘歆分《国语》为《左传》的可能。

那么《国语》这部书究竟是何人所作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国语》同上古其他史书一样，并非一人所作，也非一时而成。它最初可能是由瞽史在口头上传诵，当时最著名的瞽史便是失明了的左丘明，他很可能像古希腊盲诗人荷马那样传诵着古代史实，被另外一些学者记录编纂而成，这些学者素质不及子夏等人，于是便出现了《国语》文体风格稍逊于《左传》的情况。《国语》的增补加工过程止于战国前期，这就是为什么《国语》记事晚于左丘明的原因。

《国语》的内容比较丰富，它以记言的形式，记录了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之际400年间历史，共有21篇，其中《周语》3篇、《鲁语》2篇、《齐语》1篇、《晋语》9篇、《郑语》1篇、《楚语》2篇、《吴语》1篇、《越语》2篇。晋国历史在里面占了较大的比重。在记各国历史时，《国语》分条排比，记录了各国历史人物的对话与议论，间以相关史实和事件，整个编排方法近似资料汇编，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材料。

《国语》作为上古时代出现的史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尽管《国语》与《左传》有许多重复、交叉的地方，如《国语·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就多与《左传》重复，以至于人们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把《国语》叫做《春秋外传》，但《左传》却无法取代《国语》。因为《左传》是编年体，是记事的，而《国语》是国别体，是记言的，二书编排方法不同，内容重点也就不同。《国语》主要记录了春秋时

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这对于研究先秦思想史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这一点是《左传》所不能与之比肩的。如《国语》卷一《周语》开篇载录了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勿征犬戎的一段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双滋大。”并用周朝祖先在戎狄之间以德治民终得天下的例子来说明,最后说:“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这段议论便反映了西周时人的“德治”的政治思想,主张怀柔而不主张动武。这种记载在《左传》中便比较简单,由于《左传》侧重记事,所以在昭公十二年中仅记道:“昔穆王谷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就没有记下祭公谋父的思想活动。再如关于齐鲁长勺之战,《左传·庄公十年》是侧重于战争过程描写的,从“十年春,齐师伐我”,直到“遂逐齐师”,叙事完整,而对于曹刿的议论则写得较略,仅云:“小惠未遍,人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尽心理狱)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而《国语·鲁语上》则既不写长勺之战的开头,也不记其结尾,而是集中记录了曹刿对鲁庄公的谈话:“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小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当庄公说他将以情断狱时,曹刿称赞道:“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这大段的议论,就是《左传》所不具备的。尽管《左传》叙事简洁,《国语》“文词枝蔓”,但正是赖此“文词枝蔓”,使《国语》在记载先秦人的思想活动上远胜于《左传》。《国语·鲁语》记曹刿言论,突出了曹刿的“德治”思想、平均主义思想和民本思想,尤其是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几千来年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国语》还通过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的历史。如《晋语》记晋献公伐骊戎时,晋大夫史苏便以“女祸”理论,劝晋献公放弃进攻,他说:“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昔夏

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在史苏看来，华夏伐戎，会使戎夷献出美女以求和，而美女只要一到华夏君主的身旁，就会祸乱国家，从而使国家灭亡。所以“女祸”是导致历史发展进程中断或倒退的根源。这就是史苏的历史观，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历史观。这种观念赖《国语》记录，使我们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认识水平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国语》对思想活动的记录，是《左传》所不及的。

《国语》的史料价值，不仅在于记叙了大量的先秦思想史的史料，而且还在于它记述了大量《左传》和其他史籍未记载的政治制度、外交礼制、军事活动、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史料。关于政治制度，如《国语·周语上》中祭公谋父对周穆王所谈的一番话中，就记载了西周时期的中央与封国的关系制度，以及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礼仪、刑赏制度：“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乾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段有关西周政治制度、统治方法的材料，是《左传》中所没有的，也可以补《周礼》之不足。《国语》还记载了一些古代的外交礼制，如《周语中》记单襄公对周定王讲的一段话说：“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效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百官以物至，宾人如归。’”这段史料就是比较珍贵的。《国语》虽不专门记事，但仍然记叙了一些战争过程和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有些加了记述性文字，有的则以对话形式描述。不少军事活动的记载都是《左传》等上古史书所不多见的。如《国语·越语》就记述了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入吴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最终灭吴的全过程,这些史料都是《左传》所没有的。《国语》还记载了一些西周经济制度的情况,如《周语中》载单襄公之言道:“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效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疲。国有班事,县有序民。’”这里便记录了西周绿化道路、设义食于路、建立牧业、林业及副业,以及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这些史料在其他书中是不多见的,足见《国语》史料价值之珍贵。

据杨伯峻先生考证,《国语》的《周语》、《郑语》、《齐语》所载内容多不同于《左传》,《越语》更是《左传》所不具备的,因此,《国语》的史料价值是《左传》所不能取代的。《国语》对于上古历史的了解、对于古代文明的塑造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国语》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它那珍贵难得的史料上外,还体现在它那独具一格的编纂体例上。《国语》开创了中国史学体裁的新体例——国别史,影响史书编纂达数千年。众所周知,在《国语》之前,中国史书体裁只有汇集典谟、训、诰的记言体,如《尚书》,以及按年月系事的编年体和记事体,如《春秋》。《国语》虽然继承了《尚书》的记言特色,但那只是从内容上说的,在编纂体例上,它则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按国家分类,把某一国的事集中在该国标题下进行记叙。《国语》打破了《春秋》和《左传》那种按年记事、各国历史相互穿插的方法,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的类别,把春秋时期的历史分开叙述,对于读者了解某国历史的纵向发展极为便利。

《国语》在国别史的开创上是成功的。尽管《国语》是众手杂成,不免有风格不统一的缺点,正如清人崔述所说的那样,“《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但是,所有参与修纂的人都保持了《国语》的按国分述的编纂体例,并且在某些部分和某种程度上,使《国语》写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如《国语》把周王室与各国并列叙事,从总体上反映了春秋年间王室衰落、各国分立的局面。在对各国历史分述时,侧重于记录官僚集团的言辞议论,通

过对话来反映人的思想观念和歷史事件，有时则于记言之中兼记有关的史实与事件。如《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重点记录了管仲与桓公关于实行改革、成就霸业的一系列对话，但也记叙了鲍叔推荐管仲、管仲自鲁返齐以及管仲改革实践等事件的过程。《国语》主记言兼记事的记叙体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件事情议论结束后，往往点出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趋势。如《周语》在记厉王止谤言论之后，指明道：“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样的记述，言虽简而意无穷，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令人深思。《国语》在某些篇中记言写人也比较成功。如《晋语》记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对话，就相当幽默生动。再如《晋语》写骊姬，《吴语》写夫差，《越语》写勾践，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这些都说明《国语》在编纂写作方面有值得夸耀的地方。

《国语》以其创立国别体的功绩，受到了古往今来的学者们的赞扬。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便把《国语》列为一体，把它与《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并列为“六家”。当代学者李宗邨指出《国语》“为国别史的创体”。周予同也说：“《国语》是春秋时期的国别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自成一体的史学著作。它展示历史的横断面，同编年史可以互相补充。”自从《国语》开创了国别史后，历代史家奉为主臬。稍晚一些出现的《战国策》，其体例几乎是《国语》的翻版。《战国策》也是以国分类，以记言为主。以国分类时也是将周王室放在最前面，并与其他国家并列。此后的《三国志》、《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以及《十国春秋》，也都是按照《国语》分国记事的体例写成的。《国语》创立的国别史，为平等记载若干个并立政权的历史树立了样板。

祭公谏征犬戎

穆王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规劝说：“不行！先王显示恩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平时聚集在一起，到了用兵的时候才动用；动用就能发挥出威力。动辄炫耀武力，就会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就不能叫人害怕。因此，周文公的《颂》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的是美德，把它普遍地传布。我王一定能够保持美德。’先王对人民总是勉励他们端正自己的德行，重视培养自己的好品性；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让他们有好的器物用具；使他们明白利害之所在，用礼乐典章制度去教育他们，使他们趋利避害，感念恩德而害怕威力。所以先王能够保住天下而且越来越强大起来。

“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担任农官，侍奉虞舜、夏禹。到了夏朝衰败的时候，废去后稷这一农官，不再讲究农事。我们先王不窑因为失掉他的官职，就逃到西戎、北翟之间一带。仍不敢废怠农事，常常传布祖先的恩德，继续从事祖先传下来的事业，研习祖先传下来的教诲和法典制度；从早到晚谨慎勤劳，用敦厚笃实的态度加以遵守，用忠诚信实的态度加以奉行；世代代代继承祖宗的功德，不辱没祖宗。到了武王，他发扬祖先光明磊落的品德，更加慈爱谦和，侍奉神灵，保护人民，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商王帝辛，对人民太凶恶了，广大人民不能忍受了，都高兴地拥戴武王，这样才出兵到商朝首都的郊外牧野。这并不是先王好用武力，而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才去除掉他们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是：在王城四周五百里的地区是甸服；在甸服外五百里的地区是侯服；从侯圻到卫圻共五圻，各五百里，是宾服；蛮、夷住的地区是要服，戎、狄住的地区是荒服。甸服地区一定要供应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宾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区要向天子进贡祭神的祭品，荒服地区要进京朝见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每天供应一次，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每月一次，祭祀远祖

的祭品每季一次，祭祀神灵的祭品每年一次，进京朝见天子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教训。如果有不按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心意；有不按月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言论号令；有不按季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法令制度；有不来岁贡的，天子就要检查尊卑名号；有不来朝见的，天子就要检查德行；天子按次序一件一件都做了，还有不来的，就可以加以惩罚了。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那不按日举行祭祀的，攻打那不按月举行祀礼的，征伐那不按季举行享祀的，谴责那不进贡的，教训那不来朝见天子的；在这个时候就有惩罚的法律，有攻打的军队，有征伐的武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告谕的文件。宣布了命令，陈述了道理，而还是不来，那么就在德行上加以检查，不要让人民劳苦，到远方去打仗。因为这样，那近处的诸侯就没有不听命的，远处的诸侯就没有不服从的。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犬戎君长按照他的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您却说：‘我必定要以宾服不享的罪名出兵征讨它，并借此向他们炫耀军威。’这样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并使那‘荒服者王’的礼节也遭废弃吗？我听说那犬戎的君长素性敦朴，能够遵循先人的德性，坚守终世入朝的礼节，专心不移，这样如果大王出兵征讨，他们就有理由来抵御我们了。”

穆王不听，便出兵去打犬戎，结果只获得四只白毛狼、四只白毛鹿回来。从此那荒服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召公谏厉王止谤

周厉王很残暴，国都的人都指责他。召公去告诉他说：“人民不能忍受你的政令了。”厉王大怒，找来卫国的神巫，派去监视指责他的人。只要卫巫把诽谤他的人报告他，就抓起来杀掉。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了，熟人在路上碰见了也只能以递眼色打招呼。

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够阻止人家在背地里说我坏话，现在他们不敢说了。”

召公说：“这是用暴力堵住人民的嘴巴。堵住人民的嘴巴，不让说话，比堵住河里的水，不让它流还要危险。用堤来堵住河水，就容易壅塞，一旦壅塞就会决堤泛滥，结果伤人一定会很多。限制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因此会治水的人，总是排除壅塞，开通水道，让水畅流；能治理人民的人，总是开导他们说心里要说的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叫三公九卿直到列士都献上规谏的诗，瞎眼的乐官献上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进献记载古代政治成败得失的书籍，少师进箴言，瞽者朗诵，矇者吟咏，从事各种工艺的人都来直言规劝，百姓的意见传达给天子，左右的近臣尽力地规劝，宗族亲属监督天子、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官用音乐、太史用礼法对天子进行教诲；年高有德的师傅经常劝诫天子，然后由天子去考虑研究，作出判断，因此事情做起来就不会与情理相违背了。

“人民有嘴巴，如同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财富、器物从这里生产出来；又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服食物从这里产生出来。人民用嘴发表意见，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实行好的，防范坏的，可以用它来丰富人民的财物、器用、衣服和食物。人民在心里考虑的，用嘴讲出来，考虑成熟了而后自然流露出来的意见，怎么能够堵塞呢？倘若堵住人民的嘴巴，那赞助你的人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从此国都的人没有一个敢讲话。过了三年，国都的人举行暴动就把厉王放逐到彘那个地方去了。

襄王不许请隧

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在郑复位后，襄王拿土地去酬谢他，文公推辞不接受，请求在他死后用灵柩通过墓道入葬的天子葬礼。襄王不答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得到天下，仅划出方圆一千里的土地，用它作为甸服，用这土地里出产的东西来维持供奉天神和地神的祭祀需要，用这田地里出产的东西维持百官和亿万人民日用的需要，用这土地里出产的东西来防备有不来进贡和意外的患难。

其余的土地就拿来平分给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让各人有安宁居住的地方，以此来顺应天地，不要遭到灾害。先王哪儿有什么私利呢？内宫只有九嫔，宫外只有九品，只不过足够用来维持供奉天地祭祀祖宗的需要罢了，那里敢尽情满足、肆意放纵那耳目心腹的嗜欲，而破坏各种法度？也只是这死后和生时穿用的东西的彩色花纹有所不同，用来统治百官，区别尊卑贵贱。除了这些，天子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上天给周王室降下灾难，我个人也只是守着先王故府的遗命而已，加以自己无能，以致麻烦叔父。要是分赐先王的重大葬礼给您，用来报答您对我的恩德，恐怕叔父您接受了我的赏赐以后，你自己也会厌恶，甚至责备我本人的。我怎么敢存吝惜的心呢？古人有句话说：‘改换佩带的玉，就要改变步伐。’叔父您倘若能够发扬伟大的品德，更改姓氏，改换正朔和服色，创建并掌管天下，显示出自己的功劳，那么采取天子的大礼，去统治安抚人民，那时我也许被惩罚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又有什么话说呢？倘若您还是这姬姓，仍旧列于公侯的地位，那就应尽做臣子的职责，去恢复先王的职分，这个天子用的大礼是不可以更改的。叔父您自己去努力发扬光明的德行吧。那天子大礼自然会来到的。我怎么敢因为您对我的私恩而去更改以前规定的重大制度，因此玷辱天下的人，这样我怎样对得起先王和百姓呢？又怎样施行政令、发布号令呢？倘若不是这样，叔父您自己有土地，就挖地开墓道，行天子的葬礼，我又怎么能够过问呢？”

晋文公就不敢再请求这种葬礼，接受赏给他的土地回国去了。

单子知陈必亡

周定王派单襄公访问宋国后，就向陈国借道，去访问楚国。这时节早晨已能看到火星，可在陈国道路上长满了荒草，不好走呀。候人不在边境上迎接宾客，司空也不察看道路。湖边不筑圩岸，河上也不搭桥。田野里露天堆着五谷，打麦场上的农事也没完毕。

道路的两边没有种上树，耕过的田地里种着的庄稼像茅草芽似的稀少。膳夫不送食物，司里也不招待客人住宿。国都里没有寄宿的寓所，县城里没有旅舍。百姓都要到大夫夏征舒家里去替陈灵公建造楼台。到了陈国，陈灵公和他的臣子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冠到夏姬家去了，留下客人不接见。

单襄公回来，告诉定王说：“陈侯自己不遭到大灾难的话，他的国家也一定要灭亡。”定王说：“什么缘故？”回答说：“角星在寒露节早晨出现的时候，雨水就没有了；天根征在早晨出现的时候，水塘里的水就枯竭了；氐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草木的枝叶就要脱落了；房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就要下霜了；火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冷风就要刮起来了，这一切预告人们准备防寒了。所以先王的教导说：‘九月雨水没有了，就修好道路；十月河水干了，就建造桥梁；草木凋落了，就要做好谷物的收藏；下霜了，就要准备好过冬的皮衣；冷风起，就要修理城郭房屋。’所以夏代的月令说：‘九月修整道路，十月造成桥梁。’到时候又警告人们说：‘收拾起打谷场上的农事，准备好畚箕箩筐。定星出现在天中央了，修建房屋的工作开始了。火星刚出现的时候，大家就都到里宰那里集合。’这是先王之所以不费财物，却能对天下百姓普遍地给予恩惠的原因。现在陈国在早晨已经能看到火星了，可是道路还像塞住一样，田野里的打场好像已被废弃一样，湖畔不筑圩岸，河上没有船只和桥梁。这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呀。”

“《周制》上有这样的话：‘一排排地种起树来，用来标明道路；在四乡设立房屋，备着食物，用来守护道路；都城外边有放牧牲畜的地方；边境上有客舍和迎送宾客的人；洼地长着茂盛的草；苑里有树林和池塘；这些都是用来防备兵灾和荒年的。那剩余下来的地也没有一处不是种五谷的田地，百姓家里没有挂起来不用的犁耙锄头，田野里没有深草，不耽误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不浪费农民的劳动力。大家都富裕而没有贫乏的，生活安乐而不疲劳，都城里做的事井井有条，四乡人民有秩序地轮流劳动。’今天陈国的道路荒废得不能认出来，田地淹没在荒草里，庄稼成熟了也不收割，